

·文献学苑·

论宋儒疑经与文献学发展的关系

杨新勋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江苏南京 210097)

摘要: 疑经是指古代儒生对儒家经籍作者和文本真实性、合理性、完整性的怀疑, 往往出于经学的视角和思路, 与重客观真实的文献学有交叉但并不等同。宋儒疑经尤为显豁, 对宋代文献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成果、思路和发展轨迹三个方面; 宋代文献学对宋儒疑经也有促进和阻碍的反作用。宋儒疑经对后世尤其是清代文献学的发展也有影响, 探讨宋儒疑经与文献学发展的关系对研究传统文化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关键词: 疑经 文献学 宋代

中图分类号: G25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38(2007)05-0134-04

The Relation between Classic-suspecting Scholars in Song Dynast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Yang Xinxun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7)

Abstract: Classic-suspecting scholars refer to ancient students who suspected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authors, the text, the rationality, and the completeness of Confucian classics. Their suspicion was based on the classics themselves, a way that is overlapping but different from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in which scientific facts and authenticity are more important. These scholars in Song Dynasty made more contribution to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in the achievement, the train of thought, and the developing course.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in Song Dynasty helped and hindered the classic-suspecting. The classic-suspecting scholars in Song Dynasty influenc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in Qing Dynasty. The study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and the classic-suspecting scholars may have positive effects on the study of traditional culture.

Key words: classic-suspecting; philology; Song Dynasty

CLC number: G256

Document code: A

Article ID: 1003-6938(2007)05-0134-04

疑经是我国古代经学史上一个较为常见的现象, 早在汉代已经出现, 在明清两代也十分活跃, 尤其是在宋代获得了迅速的发展, 参与人数众多, 涉及范围广泛, 影响巨大, 成为宋代经学中一个值得深思的独立课题, 和传统学术文化发展演变的关系也十分密切, 其中宋儒疑经与文献学发展的关系尤其耐人寻味。

一 疑经与文献学概念之关系

疑经和文献学关系密切, 有些领域相互重合、交叉、密不可分。在说明二者关系之前, 先就二者的所指作一说明。

疑经属于我国传统学术的经学领域, 是指古代儒生对儒家经籍作者和文本真实性、合理性、完整性的怀疑, 内容主要有: 怀疑前人公认的经书作者、怀疑经书的真实性和完整性、非议经书部分内容的合理性, 范围包括古代的五经和后来升格的经书共十三经。屈万里先生认为疑经可以分为“怀疑先儒所公认的经书作者”、“怀疑经义的不合理”和“怀疑经文的脱简、错简、讹字等”。^[1]宋儒疑经的方法主要有文献佐证和义理审核两种。

文献学是随着 20 世纪初西学引进而兴起的一门学问, 孙

台湾大学叶国良先生在其《宋人疑经改经考》中曾经考订出宋代有 129 位疑经者, 今笔者考订为 165 位疑经者, 其中以欧阳修、刘敞、李觏、王安石、司马光、张载、程颢、程颐、苏轼、苏辙、晁说之、郑樵、胡宏、王质、吕祖谦、朱熹、杨简、蔡沈、王柏、金履祥等为代表。

收稿日期: 2007-04-09; 责任编辑: 党燕妮

钦善先生认为古文献学“就是有关古代文献典籍整理和研究的学问”，^[2]“它与古代语言文字学、古籍版本目录学以及古代历史学（包括通史、文化史、哲学史、思想史等）都有关联”，“古文献学本身又有许多分支，诸如注疏（包括字词的注音释义及天文、地理、名物、典制等的考证辨析）、校勘、目录、版本、辨伪、辑佚、编纂等。”^[3]

可见，疑经与文献学虽然相关，但并不等同，具体可作如下辨析：

1 二者的学术视角和思路不同：基于中国传统学术的社会背景和学术背景，疑经者往往出于经学的视角，其学术追求是经学的发展和演变，甚至是经学思想、经学理论的提高与完善；而文献学则产生于后封建社会，出于现代学术的视角，其终极追求是客观、清晰的历史真相和严谨、科学的学术认识。

2 二者的学术内容和领域不同，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疑经怀疑经书作者部分地表现为古籍辨伪，但又不完全等同于辨伪，由于其中颇有怀疑经义不合理的因素，其义理审核的方法使疑经更多表现了意识形态调整的因素，这使宋儒的疑经与文献学上的辨伪保持了相当距离。如欧阳修疑《易传》、《诗序》、《周礼》等有辨伪的一面，但又掺杂了一些思想方面的考虑，使其疑经不等同于纯粹的文献学上的辨伪。要真正认识欧阳修的辨伪，还必须从欧阳修的疑经中加以剥离研究才能得出其辨伪成就的真相。又如李觏、司马光、晁说之的疑孟与辨伪的距离更远。这说明疑经中怀疑经书作者的问题并非文献学上的辨伪所能概括。实际上，与明代胡应麟的《四部正讹》相比，只有朱熹疑《古文尚书》才算得上“辨伪”；而从今天文献学的角度看，朱熹疑《古文尚书》既有“辨伪”的成分，也有不属于“辨伪”的成分。

二是疑经中怀疑经义不合理，直接以义理评判经书、非议经书，表现了宋人以思想修正、调整经籍，多与文献学无涉，如宋儒怀疑《礼记》的《儒行》、《曲礼》等，怀疑《尚书》的《武成》、《胤征》等，又如疑孟和怀疑《诗经》里有“淫诗”等都主要是思想性动机造成的。

三是疑经中怀疑经籍有错简、衍脱、讹误而加以改动部分地表现为考订、校勘；但是又不完全等同于考订、校勘，由于义理因素的参与使疑经与文献考订、校勘保持了一定距离。如欧阳修对《诗经》、《春秋》文字的考订就有不少思想因

素；晁说之、吕祖谦的恢复《古易》有考订文本的方面；也有经学义理审核的方面，尤其是二程对《大学》的改动，朱熹对《大学》、《中庸》和《孝经》的改动，以及杨简、王柏对《诗经》和《大学》的改动更多是出于理学建构的需要。实际上，从清人对宋人疑经的批驳中正好可以看出疑经与文献学的不同。

疑经是发生在经学转变时期的产物，虽然会吸取很多文献学因素进来，但不等同文献学，宋儒疑经与文献学的不同尤其明显表现了这一点。因此，只从文献学的角度评价疑经是很不够的。

二 宋儒疑经与宋代文献学发展的关系

具体到疑经对宋代文献学发展的影响，我们认为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疑经往往以文献学的考据、校勘尤其是辨伪为依据和手段，疑经进展极大促进了甚至是代表了文献学的发展。

文献佐证是疑经的一类重要方法，疑经者往往主动寻找文献依据，通过对文献佐证的深入分析和全面归纳得出疑经结论，疑经的形成和发展必然会提高文献学的水平，甚至是直接表现了文献学的新发展。如欧阳修怀疑《易传》、《诗序》、《周礼》等都广泛挖掘文献依据，表现了在文献方面的深刻认识和新进展；在此基础上，苏轼、苏辙进一步搜集、辨析文献资料怀疑《周礼》的真伪表现了文献学上的新进展；苏辙、晁说之、郑樵、王质、朱熹等怀疑《诗序》也都标志着文献学的新进展。

此外，疑经的结论也部分地表现为文献学成果，如宋儒怀疑《诗经》、《尚书》、《孝经》、《春秋》等的经文多表现为校勘学成果，怀疑《易传》、《诗序》、《周礼》、《礼记》等的作者多表现为辨伪学成果，尤其是朱熹怀疑《尚书序》和《古文尚书》更是表现了辨伪学的新进展，疑经这些方面的成就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宋代文献学的一个特殊领域，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会促进、带动文献学的发展。

2 疑经表现了一定怀疑、辨析的学术理性因素，这有利于文献学的顺利发展。

疑经是宋儒较为灵活自由的一种治经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汉唐经学传统的束缚，表现了一定客观分析和知识理性的因素，对经学问题和经籍文本的认识往往非常深刻，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学术的发展，也自然会促进文献学的发展。

朱熹：“熹窃谓生于今世而读古人之书，所以能别其真伪者，一则以其义理之所当否而知之，二则以其左验之异同而质之。未有舍此两途而能直以臆度悬断之者也。”（朱熹《晦庵集》卷三十八《答袁机仲》）

展。如宋儒不信《诗序》，一定程度地摆脱了传统《诗经》学的束缚，进而能够发现问题，提出对“三家《诗》”、“淫诗”、“赋诗”和诗乐关系的新认识；再如苏轼、吴棫、朱熹、蔡沈、王柏对《尚书》的疑辨尤其表现了这一点。今天看来，欧阳修对《易传》、苏轼、苏辙对《周礼》的认识都十分深刻，司马光、吕大防、晁说之、吕祖谦等对古文《周易》的考订文献学意义突出，即使是李觏、司马光、晁说之、郑厚等对《孟子》的认识，二程、朱熹、杨简、王柏等对《礼记》尤其是对《大学》、《中庸》的认识也都是十分深刻的，就先秦儒家的心性理论方面的认识来说自有其独到之处，确实表现了宋儒在审词气、核经义方面的长处。这种深入的辨析对于宋代文献学（尤其是考据学、校勘学、语言文字学等方面）的发展和形成宋代文献学重视义理辨析的特点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无疑，正是在此基础上，宋儒黄震、王应麟时才形成了上古地理、历史的文献考据学，而清代考据学也往往由此可窥其端倪。

3 疑经影响了宋代文献学的演变轨迹，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认识：

一是疑经影响了宋代文献学特点的形成，宏观上促进了文献学的发展；同时，疑经又有阻碍文献学甚至改变文献学发展的地方。

由于疑经属于经学领域，往往有着经学思想的考虑，甚至有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这必然会影响到他们对文献的认识和使用，尤其是疑经自身文献佐证与义理审核两种方法出现冲突或矛盾时往往影响了疑经者的学术视野，阻碍了疑经者进一步深入的探讨，直接以“义理悬断”、“臆断”或“折之以理之是非”；表现的是主观随意性的渗入和学术探研的止步，从而暴露出认识上的不足，使经学研究流于简单化，而降低了经学的水平。这说明，疑经虽然提出了经籍作者和文本的真实性、合法性等问题，但疑经者远没有最终解决这些问题。疑经义理审核的方法只是一种用时代思想来解决经学疑问的方案，这种方案里反映更多的是宋人的思想和观念，从而赋予了宋代经学更多的时代性和思想性，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偏离学术本性，限制或阻碍了文献学的健康发展，从而表现出与汉唐经学和清代朴学不同的风貌。这些方面也为后来清人以“学术”视角，从疑经上批驳宋人埋下了伏笔。

宋学和理学的形成改变了疑经的轨迹，使得疑经更加推重“义理”，轻视“外证”，重视经书本体的体察，也影响人们对文献的态度，限制了人们对经学文献的进一步深入认识，偏离了客观学术本位；尤其是宋儒疑经的义理审核在一定意义上为疑经者主观随意性的引入开了方便之门，使经学研究走

向主观理论的单向展开，影响了其开放性、丰富性的历史发展，这都对宋代学术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二是与宋代“疑经派”相对又有“尊经派”，“尊经派”会寻找一些文献佐证来反驳“疑经派”的结论，这样疑经也从侧面刺激了文献学的发展。如针对欧阳修怀疑《河图》、《洛书》的言论，苏轼、曾巩、朱熹利用《论语》等先秦儒家文献加以反驳，促进文献学的发展；又如为反对郑樵、朱熹等的“淫诗”说，吕祖谦等尤其是王应麟从先秦礼乐制度和《诗经》运用、经学传统等方面深入探讨，对于考订上古赋诗、用诗制度表现出非常深刻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淫诗”说的影响。

宋代文献学也有影响疑经之处，亦可从两个方面来认识：

1 文献学的发展有促进疑经发展的一面。作为传统学术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文献学的发展是造成疑经产生的“内因”之一，文献佐证是构成疑经的一类重要方法，文献学在宋代得到长足发展对于宋代疑经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北宋前期，朝廷在整理、注释和刊印经籍方面成就卓著，宋代文化发展迅速，文献学水平得到了极大提高，欧阳修之后，疑经言论逐渐深入人心，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得力于宋代文献学的发展：宋人对传统经籍文本和秦汉经学派别的演变多详加考订，对先秦的典制、名物、地理以及语言等也不乏新的认识，尤其是在类比文本、史事考订和联系分析方面有了新的进展，宋儒怀疑《易传》、《诗序》、《周礼》、《尚书》以及《春秋》三传的完成和这些方面言论的流行在很大程度上都与文献学的发展有关。宋代“淫诗”说的形成与宋人对《诗经》流传、注释以及诗乐关系的深刻认识息息相关，这也与文献学的发展密切相关。朱熹怀疑《尚书序》和《古文尚书》与他对待文献辨伪的重视有关，也与他对待《尚书》伪孔传、《孔丛子》和《孔子家语》的辨伪成就有关。

2 文献学的发展也影响了疑经的演变。由于疑经的方法有“文献佐证”和“义理审核”两类，疑经的结论大多表现为经籍的修正和调整，这样，一方面疑经者的疑经会因文献佐证与义理审核不一致出现矛盾，另一方面疑经者的疑经结论也会与其他学者的文献认识产生矛盾。因此，宋代文献学发展必然也会影响疑经的演变。如宋人疑孟主要是从思想方面出发的，随着宋代文献学的发展，疑孟言论逐渐减弱；又如针对欧阳修的疑经，苏轼、曾巩、陈善等的反驳多从文献学入手，认识深刻，反驳也有力；再如针对宋人怀疑《诗序》和“淫诗”说的思想性动机，吕祖谦、马端临等从文献上入手加以反驳，对于改变这种局面起了很大作用。

另外还应该指出的是,宋代也出现了一些学者对宋代疑经言论从文献方面加以归纳的现象,如邵博《见闻后录》、余允文《尊孟辨》对疑孟言论的记录,沈括《梦溪笔谈》对部分疑经言论的记录,目录学家晁公武、陈振孙对宋人疑经作品和言论的著录,王应麟对宋人疑经言论的记载和发展轨迹的归纳等等。这些不但反映了他们自己对疑经的认识和评价,而且也及时人、后人认识宋代疑经提供了资料。

三 宋儒疑经对后世文献学发展的影响

元明两朝在经学上基本继承了宋学传统。理学在元代皇庆二年(公元1313年)正式升为官学,科举的经用朱熹的《四书集注》为标准,经义的《诗》用朱熹《诗集传》,《书》用蔡沈的《书集传》,《易》用程颐和朱熹的注本,《春秋》用胡传和三传为标准。明初科举所用经注与元代基本相同,明成祖永乐十二年(1414年)修《四书》、《五经大全》几乎全袭宋、元经说,此书后被勒为科举功令。

在此背景下,宋儒疑经对元明文献学的发展也有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宋代疑经中有很多文献学的因素,文献佐证是宋代疑经的一类重要方法,疑经的不少结论表现为文献学成果,疑经的结论和方法必然会对后世的文献学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文献学的发展,如明代杨慎、梅鹗、陈士元、周应宾考订经书异文就与宋人疑经中怀疑经书文本有关。尤其是明代许多辨伪学家就是在继承宋人疑经的基础上进一步取得辨伪成果的,如杨慎、季本、归有光、陈元龄等考辨易图,郑晓、郑瑗、梅鹗、归有光、焦竑等考辨《古文尚书》,杨慎、王道、郝敬等考辨《周礼》等,都继承宋人疑经成就和方法,并有了新的发展,可以说明代群经辨伪学是在继承宋代疑经成就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二是随着宋学在明代的演变和危机的出现,宋儒疑经在文献学上的不足也暴露出来,这也侧面刺激了明代文献学尤其是考据学的发展,使其在明末走出宋学束缚,如杨慎、郑瑗、黄佐等就对宋儒疑经、改经提出了不少批评意见。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明代文献学的发展尤其是考据学的兴起是对宋学和宋儒疑经的反动。

疑经在清代也有一定的影响,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清代的文献学发展往往受宋代疑经的影响。宋代疑经在文献学方面的成就和方法为清人汲取和发展,如清人汲

取宋人考订六经文本的成就加以发展;又如清人继承宋人怀疑《易传》、《诗序》、《尚书》和《尚书序》、《周礼》和《礼记》等的成就,进一步从文献学上加以考订等。

二是清初经学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宋学传统,转而向汉代古文经学靠拢,因此他们往往批驳宋学,主张尊经,宋儒疑经遂成了他们批驳宋学的口实、把柄,认为宋人“师心臆改”、“诬经”、“妄圣”,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宋儒疑经成了部分清人的反面教材。无疑,宋代疑经的一些结论可能在文献学上存在不足,其义理审核的方法影响、制约了宋儒对文献佐证的运用,影响了他们对文献的进一步深入认识,他们直接改动经籍的做法也与文献学的原则不合,宋儒疑经的尝试为后人在疑经之后转而走向文献考订来治经提供了教训和启示。

三是清代后期今文经学兴起,往往不自觉地采用宋人疑经的思路和结论来说,如龚自珍、魏源、康有为等重视对《春秋公羊传》大义的阐发,而怀疑《左传》、《周礼》等古文经就与宋人疑经的思路颇为相似。

二十世纪以来,受西学和时代影响,中国传统学术转变为现代学术,传统经学的势力发生了逆转;但是,宋代疑经却因古史辨派的出现而倍受重视。古史辨派十分重视对宋代疑经的研讨,他们把疑经等同于辨伪,具有为其“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服务的一面;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古史辨派对宋代疑经研究的成果,尤其是应该看到他们对疑经中文献方面的认识十分深入,这为此后人从文献学方面来认识宋代疑经奠定了基础。

今天,审视宋儒疑经与文献学的关系有利于看清宋学的性质和特点,有利于厘清经学的组织结构和历史演变,也有利于认识我国历史上传统的思想、文化与学术在特定时代和社会的互动关系。其中的经验和教训无疑对于我们认识传统文化和指导社会实践都有一定的现实启发意义。

参考文献:

- [1] 屈万里.宋人疑经的风气[A].书佣论学集[C].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
- [2][3] 孙钦善.中国古文献学史[M].北京:中华书局,1994:1,3.

作者简介:杨新勋(1971-),男,山东惠民县人,文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宋代经学与文献学。

《四库全书总目》在范处义《诗补传》条时认为宋代“儒者不肯信传,其弊至于诬经,其究乃至于非圣。”